

# 竞技政治化的历史审视与本质批判

孙玮

(吉林体育学院 教务处, 吉林 长春 130022)

**摘 要:** 以历史和哲学的视角, 通过对城邦制度下的古希腊竞技、象征着帝国荣耀的古罗马竞技、中世纪骑士制度下的骑士竞技、近代得以复兴并曲折发展的现代奥林匹克竞技, 以及当今中国竞技“举国体制”所显露的政治因素的分析, 理清了竞技政治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论述了以游戏为本质属性的竞技在各个发展时期与政治所存在的密切关系, 阐明了竞技在为政治目的服务之时与其内在的本质属性的疏远, 同时也指出竞技与政治相互依托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体育社会学; 竞技与政治; 游戏; 古希腊; 中世纪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2)01-0044-05

## Historical examination and essential criticism of competition politicization

SUN Wei

(Teaching Affairs Division, 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angchun 13002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by analyzing political factors revealed under ancient Greek competition under the city-state system, ancient Roman competition symbolizing imperial glory, cavalier competition under the chivalry system in the Middle Ages, modern Olympic competition revived and circuitously developed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nationwide system” for competition in China today, the author sorted out the context of history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on politicization, expatiated on close relations existing between competition that bases its essential attribute on games and politics in various development periods, clarified the estrangement of competition from its intrinsic essential attribute when it served political purposes, and pointed ou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 of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completion and politics.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 competition and politics; game; ancient Greece; Middle Ages

与其它事物一样, 竞技有其固有的本质属性。著名体育学者林笑峰<sup>[1-2]</sup>从逻辑学、语言学和哲学等角度以竞技与体育概念辨析入手对竞技的本质进行考察和研究, 坚持了竞技(sport)不是体育(physical education)的观点, 并分别阐述了竞技的游戏属性和体育的教育属性。李力研<sup>[3]</sup>从竞技的外在表现形式上, 以历史和哲学的方法阐明了竞技的游戏属性, 从动物游戏和“剩余精力说”来阐述竞技的游戏属性, 认为从事体育是“自身剩余精力的外在投射”。周爱光<sup>[4]</sup>认为竞技是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或者挑战性、娱乐性、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胡小明<sup>[5-6]</sup>从美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论述

了竞技的游戏属性。韩丹<sup>[7-8]</sup>从词源学角度阐明了竞技与游戏之间的概念联系。这些论文以较大的篇幅对竞技概念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分析和考证, 详细探讨了sport这一概念的内涵, 并提出竞技起源于游戏的观点, 以及阐明了竞技的游戏性和娱乐性特征。

尽管游戏属性构成了竞技之内在精神的核心, 但是竞技毕竟不同于单纯的游戏, 而是一种有高度组织的社会历史性活动。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之后, 政治便开始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中枢调控的作用, 并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这一点来看, 竞技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又是必然的。政治与竞技的结合

收稿日期: 2011-06-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设体育强国战略选择与实施重点问题研究”(10BTY004)。

作者简介: 孙玮(1970-), 男,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体育哲学。

在某种意义上极大地推动了竞技的发展，但却造成了与其固有的游戏属性的疏远。

## 1 古希腊、古罗马竞技的政治化

古希腊是民主政治的摇篮，人们在政治上能够享受较为充分的自由，几乎在这个时代的任何阶段，即便在“僭主政治”时期，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都不缺乏。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是竞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沃土。然而，虽然古希腊有着相对自由的民主政治，但这只是对于希腊各城邦及其海外殖民地，这种自由却是排斥其他民族的。从其竞技主体上看，参赛者必须是希腊血统的自由公民，而将异乡人、妇女、公民、奴隶、战俘和受指控的人均排除在赛会之外；竞技的目的除了对神的赞美以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颂扬之外，从其政治功能上看，还有着为所属城邦争得荣誉、显示城邦实力，以及为战争准备的政治功能。

在竞技的政治功能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为战争做准备。这一点在斯巴达和雅典表现得尤为明显。斯巴达竞技具有很强的教化价值，而这种以竞技为手段的教育却是为战争服务的，这是由当时所处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由于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力量的悬殊，斯巴达只有按照全民皆兵的社会运作方式，以及紧绷的战争意识，方能有效组织整个城邦的各种活动，进而稳固地掌握政权。在斯巴达，人们从孩童期便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并将竞技作为一种手段使身体素质 and 战争技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艰苦的训练和残酷的竞赛塑造出了骁勇善战的勇士，以应对随时到来的战争。然而，无论战争多么激烈，希腊各城邦之间均有约定俗成的神圣法则，在举行奥林匹克竞赛节庆期间，所有城邦都必须放下武器，停止一切形式的战争。无论哪个城邦违反了该原则，就会遭到其他城邦的联合惩治，这便是奥林匹克游戏持续千余年的“神圣休战原则”，从中体现了奥林匹克游戏追求和平的政治理想。与斯巴达不同，雅典竞技虽然也有战争准备的这一目的，但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则是通过刻苦的身体训练和浓厚的文化熏陶，将竞技者塑造成为城邦所需的优秀公民。

古罗马虽然对古希腊竞技文化的保存与传播起过较大的作用，但基本没有对希腊竞技内容进行过任何改变；古罗马虽然继承了古希腊竞技活动的外显形式，但却没有完全传承古希腊竞技中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此外，古罗马竞技有着比古希腊更为突出的政治目的。古罗马的帝国时代内战停息、政局稳定，一方面竞技成为人们放松心情、追求快感和发泄情绪的游戏方式，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古罗马帝国维持政权、建立帝国形

象的政治工具。国家修建各种娱乐和休闲的配套设施供富有的阶层进行娱乐、休闲和社交，在竞技场中每一个人都在进行着自己所喜欢的运动。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尔在其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涌向首都的罗马人的典型形象：只要他们没有得到面包和没有看到竞技场表演，就一直无精打采。一旦他们喜欢的人获胜了，他们竟乐以忘飧，欣喜若狂，将自己崇拜的偶像奉若神明。如果某个被视为不可战胜的角斗士吃了败仗，那时城里便会呈现出只有执政官们在坎纳城外失败后才出现过的那种悲痛、沮丧的气氛<sup>[9]66-67</sup>。

如果将古希腊竞技称为“文明的游戏”，那么便可以称古罗马竞技为“野蛮的游戏”。德国哲学家席勒在描述古希腊和古罗马竞技差别时曾描述道：“希腊各民族在奥林匹斯赛会上寻欢，是通过不流血的力量、速度、灵巧的比赛以及更高尚的智力竞赛，而罗马民族则是通过一个倒在地上的格斗士或他的利比亚对手的(狮子)垂死挣扎得到满足的。”<sup>[10]</sup>古罗马共和时代，随着大规模的竞技赛会日益频繁，竞技场内的表演变得愈来愈刺激和残忍。热衷于享受快感和刺激的人们对竞技中所蕴含的美感需求逐渐减少，他们喜欢看人与兽之间的争斗，追求感官刺激。而那些有着美的展现的竞技者得不到喝彩，从古希腊人那里传承下来的拳击赛也变得越来越残忍，而那些所谓不惜牺牲生命的勇猛角斗士和博得观众欢心的职业竞技家，却成为了全民偶像。独具特色的古罗马竞技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页。但与古希腊相比，罗马竞技过于狭隘，其中体现着单纯的感官享受以及动物式的野蛮争斗，同时也存在着更大的实利性，其目的是通过展示帝国荣耀以达到加强团结和巩固政权这一政治目的。

## 2 中世纪骑士制度下的骑士竞技

西欧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是骑士阶层所特有的组织制度、法律规范、道德准则及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的总和。因而，骑士制度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更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为哲学家和史学家提供了一把神奇的钥匙。借助这把钥匙，他们得以解释在这个混乱而扑朔迷离的文化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性的因素，正如赫伊津哈<sup>[11]</sup>所说：“这种视骑士制度为社会基础的观点，无论多么肤浅和荒谬，却仍是他们在普遍的政治思想方面最好的一种观点……于是历史被缩减为君主的荣誉与骑士的美德的展示，成为在高尚、壮观的规则下进行的一场高贵的游戏。”从狭义的角度看，骑士制度是为军事目的而生的一种军事制度；但从广义上看，它更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拥有一定财产的骑士阶层被视为神圣的僧侣阶层，其生活的核

心一方面是忠于其所属的主人,而另一方面便是对荣誉的追寻。

在一定意义上讲,骑士竞技所展现的是骑士精神,而这种精神的背景却是一种骑士制度。骑士精神是欧洲中世纪骑士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种精神从其构成和表现来看便是一种游戏精神的反映。黑格尔<sup>[12]</sup>曾对组成骑士精神的主要内容有着如此的评价:“使主体达到这种无限性的主要有三种情感:那就是主体的荣誉、爱情和忠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伦理的和道德的特质,而只是主体塞满了它自己的那种浪漫型的内心生活所采取的一些形式。因为荣誉所争取的人格独立并不表现于对社会的英勇或是公私生活中的诚实公正,反之,它只是为个别主体的地位的承认和不可侵犯性而奋斗。”从黑格尔对骑士精神的概括中,可以看出骑士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超越的精神,体现为主体欲达到的一种无限的精神境界。这些骑士们通常在形式上表现出很高的伦理与宗教标准来展现其内在的超越精神,以满足于在非真实的虚拟时空中营造一种崇高生活的荣誉,这种游戏因素实际上是形成骑士精神的真正因素,这便是游戏般的“骑士精神”的本质。但在某种意义上,骑士竞技的内容及其所展现的精神与教会所倡导的内容是相悖的,而竞技正是在骑士阶层与教会这种若即若离的纠缠中得以存在和发展。

中世纪早期,骑士机构内的竞技标准实战性极强,这是由当时封建主之间充满复杂而激烈的斗争现实,以及当时战争所必需的强健身体素质要求所决定的。在骑士的比武中,完全取消了与战争关系不甚密切的“球戏”,甚至与战争有一定关系但却具有较大娱乐性的竞技也被取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14 世纪,骑士竞技的重要内容——比武大会在 14 世纪得到了完善,且其军事价值逐渐被弱化,而游戏性和娱乐性的成分逐渐增多,人们在其中更多地体会到了愉悦、美感和荣誉。同时,新兴的骑士阶层不仅沿袭了骑士的封号,而且沿袭了击剑、骑马、游泳、球类等骑士竞技,其目的不仅代表或展现着上流社会生活模式,其主要目的更体现为对娱乐、消遣和社交的要求。这样,伴随着骑士制度的日渐衰落,外在的实利性目的已所剩无几的骑士竞技便逐渐过渡到了一种有着非实利性的为自身目的服务的“绅士竞技”,其形式、内容和价值也随之改变了。中世纪中后期,虽然“热兵器”尚未广泛地运用到军事领域,但骑士组成的军队已多次被身披轻甲、装备灵活的英国等国家的军队所击败。这样,骑士的作用大大降低,为战争目的而存在的诸如比武大会等竞技,便基本失去了其实际的价值。至

此,发端于 9 世纪末西欧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在 12 世纪达到高峰,此后便渐趋衰退。实际上,到了中世纪的中后期,游戏性的竞赛活动已逐渐地脱离了其实利性的目的而成为骑士竞技的重要内容。骑士竞技与其政治目的分离,形成了竞技单纯精神性展现的存在,这便失去使骑士竞技赖以生存的外部动力,其衰退也就在所难免了。

### 3 现代奥林匹克游戏的政治化

现代奥林匹克游戏在创建之初,被认为是不受政治因素影响的比赛,它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个人”之间的竞赛,而不是国家或政府之间的争斗。《奥林匹克宪章》中明文规定,在奥林匹克区域内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示威或政治、宗教或种族性的宣传。国际奥委会领导人也强调体育与政治的分离,如布伦戴奇认为:“我们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体育完全脱离政治。”基拉宁也指出:“奥林匹克运动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政治、宗教或种族的干预”<sup>[13]279</sup>,从中体现出奥林匹克游戏为自身目的服务的自由属性。然而,除了最初几届奥运会之外,随着其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奥林匹克与政治也走得越来越近。

在阶级社会中,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必然,而奥林匹克游戏正是在国与国、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之时得以复兴。这样,作为一项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社会性活动,奥林匹克游戏必然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甚至成为政治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它的作用如此之强大,以至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解除美国对南非制裁之前,先要观望媒体和公众对于国际奥委会所作决定的反应。而在汉城奥运会上,奥林匹克游戏同样为所有职业政治方面的努力失败后所造成的僵局寻找到了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sup>[14]</sup>。

从现代奥林匹克游戏的发展来看,其远离政治的初衷成为了解决国与国之间政治冲突的重要手段,虽然有时其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顾拜旦重建奥运会的初衷是试图通过参加竞技以激励法国青年,通过国与国之间运动员的竞赛,对青年进行教化以培育他们对法国的自豪感及其忠诚感。他写道:“一个人在看到自己的俱乐部或学院在全国比赛中获胜会感到一种满足。当他看到自己的国家获胜,这种感觉将是何等的强烈!就是出于这些想法,我寻求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sup>[13]280</sup>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林匹克游戏的影响与日俱增,人们对它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奥林匹克游戏已经成为了一项国家大事,于是在升国旗、奏国歌的基础上,开始统计各国所获奖牌总数,进行国家之间的排名,甚至竞技实力的强弱成为国家综合

实力强弱的标志。显然，这与奥林匹克宪章中所规定的只是个人之间展开的游戏原则相悖。

奥林匹克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乃至成为了国与国之间政治斗争的晴雨表。一些政客丝毫不关心奥运会的成败，他们所想到的只有自己的政治利益、国家问题，使现代奥林匹克远离其固有的价值属性，成为极端重要的政治砝码，取消奥运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然而，奥林匹克游戏能在这样的政治运行模式中艰难前行，而每次都能安全度过危机，甚至愈发繁荣，其中必有其得以存在的价值根基，它既反映在了其外在的政治价值，同时也体现在了内在的精神价值。所以，顾拜旦及其亲密盟友逐渐认识到了奥林匹克游戏的这把“双刃剑”，它既能够激起最崇高的情感，也能促发最贪婪的欲望；既可用以创造和平，同样也可用来制造仇恨。因此，为了有利于竞技在国际上的发展，顾拜旦打算将奥林匹克游戏与传播人道主义思想、消除等级差异、打破民族和种族的界限，以及克服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等活动结合起来，这同时也是奥林匹克游戏教育青年这一宗旨的集中体现。

#### 4 “举国体制”：中国独有的竞技管理体制

“举国体制”是指为了国家的利益，动员和调配全国之力，攻克对本国具有重大价值的项目的政治体制，体现了我国计划经济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长期以来，与其它难以攻克的国家事物一样，竞技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事务而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其以“举国体制”为自身的管理体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中国的竞技举国体制是针对于“奥运争光计划”而制定的行之有效的竞技管理体制。多年来，这项体制使中国的竞技水平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和百枚奖牌佳绩的取得，更充分地显示了此项制度的优越性。鉴于此，中国的竞技高层管理机构的官员和理论界诸多学者，几乎均认为举国体制是合理和有效的竞技管理体制，且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但作为现实生活中在一定思维形式支配下的竞训体制，诸多不足之处值得我们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

当今中国竞技事业飞速发展，其运行模式显示出了现实的合理性，但现实的合理性未必代表了未来的合理性，这种模式应该根据现实的和未来的发展特征作以适时调整。马克思把人或社会发展分为 3 个基本形态<sup>[1]</sup>，即“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形态，人的“自由个性”联合体形态。这是人的发展不可逾越的 3 个阶段。在“人的

依赖关系”阶段，人的生命特征表现为“小我”对“大我”的依赖。“小我”在“大我”这一群体中消失了，群体成为个体生命的代言人<sup>[6]</sup>。在“物的依赖”阶段，人摆脱了群体转而过渡到对物的依赖。社会发展到了第 3 阶段，人又重新回到了“群体”之中，然而，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群体之中每个人都具有“和而不同”的独特个性，每个人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呈现为“自由个性”的联合体形态，这便是所谓的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在人类正在努力跨越第 2 个阶段的今天，第一阶段，即以人的依赖关系表现的“群体本位”阶段还普遍地存在于竞技领域，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人的依赖关系”，是人作为人在初始阶段的生存本性和存在状态，虽说这是竞技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表现出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形态，但从人学角度讲却是不尽合理。在这种竞技运行模式中，每个人的才能和潜质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挖掘。这种模式形成的集体是一个几乎封闭式的小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主体的个性大部分被遮蔽，正如古希腊“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属于城邦”一样，竞技者的生命属于国家、种族、运动队或教练，唯独不属于他自己，表现为他所从属群体的“大我”对“小我”的压制。在竞技领域只需要有人的本能生命就足够了，竞技者的目的是跑得更快、投得更准、跳得更远，别无他求。

当今中国竞技已经走过了辉煌的 60 余年，“举国体制”下的竞技硕果累累。从摆脱“东亚病夫”这一恶名的强种工具，到象征中华民族崛起的“零的突破”；从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乒乓外交”，到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女排精神”；从抗议种族歧视的政治工具，到争取女权运动成功的象征符号；从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格言，到身心塑造的教育工具；从冷战时期的政治砝码，到追求和平的政治寄托；从象征着各省市区综合实力的全国运动会“第一定律”到奥林匹克的“金牌战略”……所有一切均体现出国家、民族或集体对其最高利益的理想追求。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下，竞技及其主体承载着太多本不该承载的重负。多年来，计划经济下我国竞技举国体制一直围绕“奥运战略”和“金牌战略”而展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对于我们来讲，政治对奥林匹克游戏等竞技活动的掌控性和干预性显然过多，这对于实现中国竞技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举国体制下，作为一个具体的和现实的个体，其成绩的取得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成绩发挥的好坏实属正常。然而，例如奥运会冠军，国家为他们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具有自由生命的普通个体，而成为国家和民

族夺取锦标的载体。尤其受我国传统感性的思维方式和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他们的成功便是国家和民族的成功,而他们的失利也带来了举国上下的失落感。这种体制使得作为个体的“小我”生命湮灭在了作为整体的“大我”生命之中,国家与民族的成败和荣辱系于一身,竞技者承担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重”。此外,我国数百家体育运动学校中的数以万计的“二线”或“三线”青少年,甚至是儿童竞技者,他们每天承受着超负荷的训练强度,本属自愿的、愉悦的和业余的游戏变成了不得不从事的职业化劳作。由于他们长期艰辛训练以至于其教育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加上传统的“重物轻人”的竞训模式,造就出一批批竞技场中的强者而在世俗生活中自由选择度极低的“弱势人群”,这些与竞技的本质属性相悖的现象不得不使我们对竞技的这种运行模式进行深刻思考。

虽然竞技举国体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体制却与我国社会发展呈现不契合的状态。如果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来讲,就必须对竞技的这种管理体制及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即如果我们单纯从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来讲,竞技的这种管理体制是合理的,但从培养健全人格的角度来看却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纵观竞技发展史,它与政治活动如影随形,政治目的构成了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外部推动力。然而,通过对竞技的起点、词源、特征,乃至基本形态的分析得知,游戏属性是竞技得以存在的内在因素,这样,竞技为自身目的服务的非实利性特征决定了它理应绝缘于诸如政治等活动。然而,竞技毕竟不同于单纯的游戏,作为一种有着高度组织的社会文化活动,它必然与诸如宗教、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活动相结合。历史上看,竞技的政治化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以及近现代社会中均有着充分的表达。而在当今中国,竞技与政治已经实现了紧密的融合,二者相互促进,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效益,而且也使得竞技事业有了迅猛的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竞技管理体制已经逐渐显露出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政治目的与资本目的的矛盾、运动员竞训与教育的矛盾、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矛盾,乃至“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的矛盾等等,这就

需要竞技在实现其外在目的的同时,不至于丧失其内在的本质属性。二者只有保持适当的张力而达到微妙的平衡,方能促进竞技的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林笑峰. “真义体育”之真义——兼答熊晓正同志质疑[J]. 体育文史, 1996, 3(6): 6-8.
- [2] 林笑峰. 从日本出版《现代美国 SPORT(竞技)史》看美国体育思想的变迁[J]. 体育学刊, 1995, 2(3): 96-98.
- [3] 李力研. 论体育游戏——透析西方主要游戏理论的体育观[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5, 21(3): 1-4.
- [4] 周爱光. 试论“竞技体育”的本质属性——从游戏论的观点出发[J]. 体育科学, 1996, 16(5): 4-12.
- [5] 胡小明. 游戏的美与美的游戏——再论 SPORT 文化属性的皈依[J]. 体育与科学, 2002, 23(5): 1-4.
- [6] 胡小明. 竞技运动文化属性的皈依——从工具到玩具[J]. 体育文化导刊, 2002(4): 15-18.
- [7] 韩丹. 论斯波特(SPORT)的源流、发展和当代形态[J]. 体育与科学, 2006(2): 4-11.
- [8] 韩丹. 论 Sport 不是体育——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为据[J]. 体育学刊, 1996, 3(4): 45-48.
- [9] 拉斯洛·孔[匈]. 体育运动全史[M]. 成都: 中国体育史学会办公室, 1985: 66-67.
- [10] 弗里德里希·席勒[德]. 审美教育书简[M]. 冯至,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80.
- [11] 约翰·赫伊津哈[荷]. 中世纪的衰落[M]. 刘军, 译.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7: 63.
- [12] 黑格尔[德]. 美学: 第 2 卷[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316.
- [13] 任海. 奥林匹克运动[M]. 北京: 人们体育出版社, 2005: 279-280.
- [14] 理查德·W·庞德[加]. 奥林匹克内幕[M]. 屠国元,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 121.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24.
- [16] 孙玮. 竞技运动中人的生命观[J]. 体育学刊, 2007, 14(8): 20-23.